•论坛•

主要利益相关方在履行《名古屋议定书》中的关系与义务

张渊媛^{1,2}, 钟震宇^{1,2}, 程志斌^{1,2}, 吕凤春³, 蔡譔³, 白加德^{1,2*}

1. 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 北京 100076; 2.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 北京 100076; 3.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国家环境保护区域生态过程与功能评估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012

摘要: 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涉及三个主要利益相关方, 即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在我国履行《名古屋议定书》的过程中, 需深刻理解《名古屋议定书》中对于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的相关规定, 分析三方关系内涵及各自义务, 对有效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提出, 为促进公平和公正的惠益分享, 提供方有义务明确生物遗传资源的原产地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原产的生物遗传资源, 确定生物遗传资源的原始持有社区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原始持有人(或地方社区); 通过调查、登记和编目, 分析遗传资源的起源、形成及利用历史, 建立当地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档案; 通过ABS知识培训, 提高参与“获取与惠益分享”事务的能力, 特别是与使用方谈判ABS协议的能力。使用方有义务履行国际公约规定的“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原则, 在征得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和实质性参与下, 与土著和地方社区经共同商定条件, 签订体现公平惠益分享的ABS协议; 使用方要尊重土著和地方社区对保护和提供生物遗传资源的贡献, 制定行为守则, 履行社会责任; 还要在论文发表及专利申请时披露所使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来源和原产地。监管方有责任建立完善的ABS政策和法规体系; 建立ABS信息交换机制, 发布ABS相关信息; 规定提交获取申请所要求的材料, 提供“ABS协议”的模板, 并审查和批准“ABS协议”, 签发“合法来源证书”; 并通过建立检查点, 监督和监测ABS协议的履行。

关键词: 名古屋议定书; 获取与惠益分享; 利益相关方

张渊媛, 钟震宇, 程志斌, 吕凤春, 蔡譔, 白加德 (2021) 主要利益相关方在履行《名古屋议定书》中的关系与义务. 生物多样性, 29, 231–237. doi: 10.17520/biods.2021002.

Zhang YY, Zhong ZY, Cheng ZB, Lü FC, Cai X, Bai JD (2021) Correlations among stakehold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obligations in implementing the Nagoya Protocol. Biodiversity Science, 29, 231–237. doi: 10.17520/biods.2021002.

Correlations among stakehold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obligations in implementing the Nagoya Protocol

Yuanyuan Zhang^{1,2}, Zhenyu Zhong^{1,2}, Zhibin Cheng^{1,2}, Fengchun Lü³, Xuan Cai³, Jiade Bai^{1,2*}

1 Beij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76

2 Beijing Milu Ecological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100076

3 Sta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Eco-process and Function Assessment/Chinese Research Academy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 Beijing 100012

ABSTRACT

Background: The process of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 mainly concerns three stakeholders, namely, providers, users and administrator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in-depth relevant provisions regarding these three groups and administrators of the Nagoya Protocol (NP) under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the correlations among three stakehold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in implementing the NP in China.

Aim: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rrelations among providers, users and administrators during the process of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 to understand their respective obligations in implementing the NP on ABS, so as to provide technical support in realization of benefit sharing in a fair and equitable manner.

收稿日期: 2021-01-04; 接受日期: 2021-01-28

* 通讯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baijiade234@aliyun.com

Perspectives & Suggestions: Providers are obliged to identify the source or origin of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s, and put in efforts to protect such resources; identify the original holders (or local communities) of genetic resources and the holders of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develop a databank of local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s and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by survey, registration and catalogue; analyze the origins of genetic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history of utilization; improve the capabilities of handling ABS issues, especially the ability of negotiating with users on ABS agreements, through ABS training. Users are obliged to follow the principles of “Prior Informed Consent (PIC)” and “Mutually Agreed Terms (MAT)” required by the CBD and the NP. After obtaining PIC and MAT from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LCs), they shall sign ABS agreements with them, which reflect fairness and equity; Users shall respect the contributions of ILCs in conserving and providing biological genetic resources, develop guiding rules in practicing ABS, fulfill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y also need to disclose the source and provenance of genetic resources and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ATK) in applying for patent. Administrators, in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ABS, are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a sound ABS policy and legal system; developing an ABS clearing house system and releasing relevant information; issuing standards of ABS applications and providing a model “ABS agreement”; reviewing and approving “ABS agreements”, and issuing “Certificate of legally sourced genetic resources (GRs)”; the administrators also need to supervise and monit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ose ABS agreements.

Key words: Nagoya Protocol;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stakeholders

长久以来, 由于国际社会默认生物遗传资源为“人类共同遗产”, 在获取生物遗传资源过程中没有明确的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 三方之间亦不存在利益关系。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通过后, 尤其是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获取遗传资源和公正公平分享其利用所产生惠益的名古屋议定书》(以下简称《名古屋议定书》)通过后, 这一观念才发生根本性转变。《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确认了国家对遗传资源的主权, 获取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时必须得到原始持有方(土著和地方社区,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 ILCs)的“事先知情同意”(Prior Informed Consent, PIC), 并与原始持有方“商定条件”(Mutually Agreed Terms, MAT), 签署能公平公正体现利益关系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薛达元, 2011)。

《名古屋议定书》是一个双边机制, 其主要目的是解决生物遗传资源的提供方和使用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确保公平和公正的利益分配。按照《名古屋议定书》理解, 生物遗传资源和/或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主要涉及三个利益相关方, 即提供生物遗传资源和/或相关传统知识的提供方, 获取并开发利用相应资源和知识的使用方, 以及在整个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包括批准“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以及获取后的履约监测)中的监管方(张渊媛, 2018)。

我国于2016年9月6日加入《名古屋议定书》, 成

为《名古屋议定书》的缔约方, 具有履行《名古屋议定书》的国际义务。然而, 我国广大农村对保护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意识淡薄且根深蒂固, 缺少对公平惠益分享的了解, 也缺乏与获取方谈判的能力, 长期以来都是弱势方。而生物遗传资源的使用方长期以来一直都是强势方, 他们缺乏对自身义务的意识, 无偿或者施惠式地获取和使用由土著和地方社区长期保存和创造的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对于监管方来说, 获取与惠益分享也是新的领域, 由于缺少健全的法规制度, 监管责任不明确, 监管力度低下。因此, 研究三方关系和责任对我国履行《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在理解《名古屋议定书》相关条款的基础上, 解读在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中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的相互关系, 分析三方各自的义务, 旨在通过协调三者关系并明确三者义务, 促进《名古屋议定书》在我国的有效履行。

1 三方关系与义务分析

《名古屋议定书》共有 36 个条款和 1 个附件。尽管没有直接以三个利益相关方为标题的条款, 但其实质内容都涉及三方, 暗含了三方在获取(事先知情同意)、利用(商定条件)、惠益分享(体现公平和公正), 以及签发合法来源证书、信息交换、检查点设置、跟踪监测、履约、国家联络点、跨界合作、能力建设、技术转让等过程中的关系和义务(Box 1, 2, 3)。

Box 1 提供方应有的权利与义务

《议定书》在其序言中明确表述：“进一步认识到促进遗传资源的提供者和使用者就共同商定条件进行公平与公正谈判的重要性”“认识到土著和地方社区持有或拥有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情况的多样性”“意识到在其社区内查明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正当持有者是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权利”。

《议定书》第5条(公正和公平的惠益分享)明确规定：“各缔约方应根据有关土著和地方社区对遗传资源的既定权利的国内立法，酌情采取立法、行政或政策措施，以确保根据共同商定条件，与有关社区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利用由其持有的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第6条(遗传资源的获取)中规定：“各缔约方应根据国内法酌情采取措施，以期确保在土著和地方社区对遗传资源拥有准予获取的既定权利的情况下，获取此种遗传资源得到了土著和地方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或核准和参与”。

Box 2 使用方的义务

《议定书》第2条(用语)中专门对“利用遗传资源”做了定义：“是指对遗传资源的遗传物质和(或)生物化学组成进行研究和开发，包括应用《公约》第2条定义的生物技术。”，将遗传资源利用和惠益分享的范围限定在遗传资源本身及其衍生的生物化学化合物，当然也包括相关的传统知识，这就包括了药品、化妆品和保健品的开发利用。

《议定书》第5条第1款规定：“根据《公约》第15条第3款和第7款，应与提供遗传资源的缔约方——此种资源的原产国或根据《公约》已获得遗传资源的缔约方以公正和公平的方式分享利用遗传资源以及嗣后应用和商业化所产生的惠益。分享时应遵循共同商定条件。”第6条第1款规定：“为了利用而对遗传资源的获取，应经过提供此种资源的缔约方——此种资源的原产国或根据《公约》已获得遗传资源的缔约方的事先知情同意，除非该缔约方另有决定”。

Box 3 监管方的义务

《议定书》第6条第3款要求各缔约方：“规定应在获取时签发获取许可证书或等同文件，以证明做出了给予事先知情同意的决定并拟定了共同商定条件，并相应地通告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第12条(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第2款规定：“缔约方应在有关土著和地方社区的有效参与下，建立机制向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潜在使用者通报其义务，包括通过获取和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提供的关于获取以及公正和公平分享利用此种知识所产生惠益的措施”。

《议定书》第13条(国家联络点和国家主管当局)第1款规定：“国家联络点应提供以下信息：(1)向寻求获取遗传资源的申请者，提供关于获得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信息和制定包括惠益分享的共同商定条件的程序信息；(2)向寻求获取与遗传资源相关的传统知识的申请者，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关于酌情获得土著和地方社区事先知情同意或核准和参与以及关于制定包括惠益分享的共同商定条件的程序信息”。

1.1 三方关系分析

提供方为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持有方，分为原始提供方、合法来源提供方和收集品提供方。原始提供方是生物遗传资源原产地的土著和地方社区，是真正拥有公平惠益分享权利的一方，是他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使用、保护和创新的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的传统知识(薛达元和郭涔，2009)。合法来源提供方是遵守《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以合法方式获得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一方，在他们从土著和地方社区获取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时，已在ABS协议中规定可否向第三方提供。而收集品提供方是以收集保存方式从土著和地方社区获得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一般不具有惠益分享的权利。

使用方一般为以商业目的为主的生物技术企业和以科学研究目的为主的科研机构，以及以公众教育为主的标本与活体展示。以商业目的为主的生

物技术公司和企业，其目的是通过各种手段和技术获取和开发利用遗传资源，达到商业利润最大化。

监管方一般为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负责监管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持有方和使用方在整个获取与惠益分享过程中能够遵循国际公约原则和国家法规制度，包括确保“事先知情同意”、“共同商定条件”等原则的落实，ABS协议签订与批准，合法来源证书签发，履行ABS协议的监督与监测，信息交换与共享等。

《名古屋议定书》的目标是公正和公平分享因利用生物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此目标提出的背景是：提供方和使用方在分配基于生物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时的利益关系可能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使用方借助其强大的生物勘探能力、研发能力，以及ABS事务谈判能力，常常无偿利用土著和地方社区的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致使提供方未分享到应得的惠益，这种不公正的生物剽窃现

象十分普遍(Cressey, 2014)。即便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方与提供方之间做了惠益分享的协议安排,双方的利益分配也欠缺公平,仅仅是施惠式的表示。使用方常常以商业秘密为由,占据了生物勘探及产品开发的专利权,牟取了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开发利用产生的绝大部分利益。在此过程中,原始持有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由于意识和能力不足,成为使用方任意“剥削”的弱势群体,即便有些情况下据理力争,也只能得到使用方的一些恩惠式补偿,而不能行使持有方应有的权利,实现公平惠益分享。监管方理应通过各种政策、法规和行政措施,推进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并在获取与惠益分享进程中主持公道,平衡各方利益,确保使用方合法获取遗传资源,并公平公正地与其原始持有方和提供方分享因利用此等资源而产生的惠益。

公正和公平地分享因利用生物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归根结底是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三方利益的平衡。因此,协调三方之间的利益关系对切实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具有重要意义。平衡三方关系可促进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可持续利用,创造出更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通过公平和公正的惠益分享机制,将部分惠益反馈到当地社区,促进这些地区的生物遗传资源保护,以及当地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此外,通过参与获取与惠益分享进程,增强提供方对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价值的意识,激发其保护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主观能动性,并在与使用方签订协议时,提高谈判和争取利益的能力。使用方也能在提供方的积极参与和支持下,规范企业行为,挖掘出生物资源更多的价值,开发出更多更好的产品,创造出更多的惠益,从而有更多的资金反用于支持生物遗传资源的原产栖息地保护和地方社区的经济建设,形成良性循环,这将有利于《公约》三大目标(保护、可持续利用、惠益共享)的实现。

1.2 三方各自义务分析

1.2.1 提供方义务

提供方有义务明确生物遗传资源的原产地并保护原产的生物遗传资源,确定生物遗传资源的原始持有社区和相关传统知识的原始持有人(或地方社区),明确提供生物遗传资源的利用历史和保护历程,证实在保护和利用过程中创造的传统知识、

创新和做法,明确能够代表当地社区与生物技术公司进行“获取与惠益分享”(ABS)谈判的机构或人员,并有能力参与ABS谈判和签订“ABS协议”。

保护原产地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并在监管方的指导和监管下,与国内外遗传资源使用方合作,推进获取与惠益分享制度的实施,是提供方应尽的义务。具体如下:

第一,提供方有义务确保当地原产的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使用方能否持续获取当地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取决于当地社区对原产地遗传资源的保护力度及传统知识的传承方式。因此,要采取切实有效的就地和易地保护措施,以保护当地原产生物遗传资源的永续存在和种群繁衍,确保相关传统知识的保护与传承。

第二,提供方要对当地生物遗传资源进行登记和建档管理。地方社区要借助科技力量,对当地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地点和分布进行系统调查和登记编目,并对这些原产生物遗传资源的起源和来源、利用历史、维护方法、生物学特征、人为选育及传统技术应用、对外交换与交流、民族文化内涵等进行系统整理,建立小型数据库。

第三,提供方要提高参与“获取与惠益分享”事务的能力。地方社区往往因为文化和信息交流限制,不能与商业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进行谈判。此外,还因为社区组织松散,不能形成集体力量,甚至推选不出具有谈判能力的代表。为此,地方社区要加强自身能力建设,通过ABS培训,提高参与ABS事务以及与使用方商定条件并签订ABS协议的能力。

第四,要通过学习相关政策和法规制度,提高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的意识。要充分认识到当地特有原产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价值和内涵,改变传统的观念,充分利用国际公约和国家法规赋予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

1.2.2 使用方义务

使用方因自身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在获取和开发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过程中一直处于强势。在新时代国际国内背景下,使用方需要转变思维,担负起履行国际公约和国家法规的责任,同时要尊重持有方,并肩负企业的环保、扶贫和生态文明建设等社会责任。

第一,要尊重土著和地方社区在保护和维护生

物遗传资源历史过程中的作用, 尊重当地土著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选育和繁衍生物遗传资源的传统知识和创新技术。生物遗传资源既是自然资源, 也融入了当地社区和居民的智慧和知识。例如许多农家品种的优良性状是数百年来祖祖辈辈培育而成, 而培育、贮存、食品加工的传统技术也是通过代代相传而得以传承。在许多地理标志产品的后面往往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

第二, 要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事先知情同意”和“共同商定条件”等原则。对于需要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 要依照规定提出获取的申请, 并得到提供国当地社区的事先知情同意, 在与当地社区共同商定条件下, 签订体现公平公正原则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 确保土著和地方社区能够从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开发利用中得到应有的惠益。

第三, 切实遵守遗传资源原产地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和政策。中国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方面已存在许多相关法律法规, 如《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植物保护条例》《种子法》《畜牧法》《中医药法》《生物安全法》, 地方政府(如云南省和湖南湘西州)也发布了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 对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做了不少规定, 商业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要充分了解当地国家和地方的相关法规, 做到遵章守纪。

第四, 制定企业ABS行为守则和社会责任规范。商业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要规范自己的行为, 切实遵守当地社区的习惯法、宗教习俗和乡规民约。在论文发表、产品发布、专利申请等环节披露所使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来源及原产地。同时, 商业公司和生物技术公司要在中国的扶贫攻坚、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恢复、乡村振兴战略、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的活动中发挥作用。

1.2.3 监管方义务

监管方的义务主要是监督持有方和使用方在获取与惠益分享活动中能够切实遵守国际公约和国家法规政策的规定, 使获取与惠益分享活动能够持续而健康地开展, 并确保国家、开发机构和地方社区的利益。主要义务是:

第一, 为“获取与惠益分享”提供清晰而全面的ABS法规制度体系。包括发布国家及地方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制度、技术标准与指南、合同范本

等, 提交获取申请的条件要求、审批程序、国家联络点及主管部门、国家和地方的检查点、争端解决机制, 等等。

第二, 为“获取与惠益分享”建立信息交换机制。依据《名古屋议定书》第14条(获取与惠益分享信息交换所和信息分享), 监管方有义务建立ABS信息交换所, 发布国内外相关信息、ABS进展、ABS最佳做法, 特别是ABS协议的信息(包括提供方信息、使用方信息、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信息、开发利用产品及市场信息等)。

第三, 审查和批准“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 签发“合法获取证书”。在提供方和使用方达成ABS协议的基础上, 审查协议内容, 包括提供方的原始持有身份的确认、原产资源的确认、所获取的生物遗传资源是否为国家保护物种或品种资源、是否经过“事先知情同意”、地方社区如何参与、协议中的共同商定条件是否能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等。在审核确认的基础上, 批准ABS协议的生效, 同时签发“合法来源证书”。该证书上将明确: 颁发证书部门; 颁发日期; 提供方; 证书的独特标识; 被授予事先知情同意的人或实体; 证书涵盖的主题或遗传资源; 证实已订立共同商定条件; 证实已获得事先知情同意; 商业和/或非商业用途; 是否可以转让第三方; 等等。

第四, 负责对ABS协议履行期间的监督、监测与检查。为支持履约, 各级监管方应酌情采取措施, 监测遗传资源的利用情况并提高遗传资源利用的透明度, 包括指定各级政府的联络点和主管部门, 在多个部门和生产流通环节建立多层次和多个检查点, 包括在专利审查、海关查验、项目立项、论文发表、专著出版等机构建立检查点, 审查是否披露了所使用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的来源和原产地。

2 履行《名古屋议定书》过程中三方关系的协调

能否有效履行《名古屋议定书》取决于利益相关三方(提供方、使用方和监管方)的协调, 而在协调这三方关系过程中, 监管方应该起到关键作用。在理想情景中, 三方角色清晰, 责任明确, 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许多问题。

对于提供方, 虽然被确定为原始产地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持有方, 但由于国内对于“土著人”、“地方社区”及“土著和地方社区”尚没有官方定

义,在获取与惠益分享进程中难以与《名古屋议定书》所界定的“土著和地方社区”直接接轨(张渊媛等,2019)。其次,中国宪法对自然资源权属的规定以及地方社区土地集体所有权的性质,使得地方社区对遗传资源的持有权利受到限制,难以确定地方社区是否有权要求“事先知情同意”,以及由谁代表地方社区参与和签署“获取与惠益分享协议”。此外,地方社区参与ABS的能力相对较低,而意识和能力的提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对于使用方,国外使用方的责任与国内使用方的责任不尽一致。即使同为国内使用方,外地使用方与当地使用方的责任也不尽相同。而让商业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为难的是国家ABS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对于获取和批准的程序,尚无法可依。由于商业公司和生物技术企业的背景不同,使用方遵纪守法的意识也相差很大,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遵守ABS法规的意识相对较高,而国内的地方小企业遵纪守法的意识相对淡薄。

对于监管方,行使责任的最大障碍是法规不健全,缺少与《名古屋议定书》直接接轨的国家立法与制度体系。虽然针对ABS专门立法的工作已有10多年,但至今尚未出台国家层级的ABS条例,虽然云南省和湖南湘西州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条例都有ABS条款,但仍然缺乏实施细则和技术指南。由于

机构职能调整,目前尚未明确由哪个单位具体履行ABS国家联络点和国家主管部门的职责。此外,尚未建立有效的ABS信息交换所机制,现有的信息交换所缺乏实质性内容,没有可供借鉴的ABS示范协议或案例(<http://www.absch.org.cn/yczybh/xgctzs/>)。由于全国范围尚未签订实质性的ABS协议,监管方的监督和监测责任也无从实施。

因此,在当前国内ABS进展相对缓慢的大背景下,亟需发挥政府监管方的领导力,生态环境部等主管部门应积极采取措施,在国家ABS专门法规缺失的情况下,建立能够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策略或机制,指导ABS活动有序开展。具体如下:

第一,针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持有方和其他类型的提供方,开展ABS知识的广泛宣传与培训,特别是对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通过培训提高当地社区对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价值的认识,加强地方对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可持续利用及公平惠益分享的意识、积极性和参与能力。

第二,针对国外使用方,特别是对于那些明确提出要求进行ABS的国外商业公司和企业,要因势利导地对他们开展ABS试点示范,在现有的国际公约框架和原则下,利用现有的有限国家法规条款(如种子法、中医药法、生物安全法等),以环保、农业、自然资源(林业)和中医药等部门作为主管部门,

图1 履行《名古屋议定书》三方关系与义务示意图

Fig. 1 Correlations among three stakeholders and their respective obligations in implementing the Nagoya Protocol

适当开展少量的ABS进程示范,以积累经验。

第三,针对大量的国内商业公司和企业,进行深入调查,了解这些公司和企业的业务范围,特别是药品、化妆品、保健品等行业,其产品类型、所使用的生物遗传资源或相关传统知识、获取资源的方式、惠益分享的实践,等等。还应调查农业科研机构将农家品种用于现代育种的情况,以及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开发利用与惠益分享的情况。

综上,结合三方关系与各自义务,我们提出履行《名古屋议定书》过程中协调三方关系的一般框架,详见图1。

3 结语

《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三大目标,即:保护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的组成部分(遗传资源、物种和生态系统);公平公正地分享因利用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所产生的惠益。三大目标之间相辅相成: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利用的基础,可持续利用是公平惠益分享的基础,而公平惠益分享又能支撑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目标的实现。因为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往往是贫困落后地区,通过生物遗传资源利用和惠益分享,有助于这些地区的经济改善,更体现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ABS制度的实施要有利于获取,并促进生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公平惠益分享。从这一点出发,监管方应在保护的前提下,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实用策略,鼓励使用方通过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发掘其中的科研或商业价值,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和更大的经济利益,从而使提供方获得更多利益,并间接促进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实现《公约》的三大目标。

致谢:衷心感谢编委及两位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ORCID

张渊媛 <http://orcid.org/0000-0002-7220-5879>

参考文献

- Cressey D (2014) Biopiracy ban stirs red-tape fears. *Nature*, 514, 14–15.
- The Nagoya Protocol on Access to Genetic Resources and the Fair and Equitable Sharing of Benefits Arising from their Utilization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https://www.cbd.int/abs/doc/protocol/nagoya-protocol-en.pdf> f. (accessed on 2021-1-1)
- Xue DY (2011) Analysis for the main elements and potential impacts of Nagoya Protocol. *Biodiversity Science*, 19, 113–119.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薛达元 (2011) 《名古屋议定书》的主要内容及其潜在影响. 生物多样性, 19, 113–119.]
- Xue DY, Guo L (2009) On concepts and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Biodiversity Science*, 17, 135–14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薛达元, 郭砾 (2009) 论传统知识的概念与保护. 生物多样性, 17, 135–142.]
- Zhang YY (2018) User's obligations and capacity building in practicing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Journal of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Natural Sciences Edition)*, 27(4), 27–32. (in Chinese with English abstract) [张渊媛 (2018) 使用方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中的义务与能力建设.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7(4), 27–32.]
- Zhang YY, Xue DY (2019) Access and Benefit Sharing (ABS) on Genetic Resources and Associated Traditional Knowledge: 100 Highlights. China Environment Publishing Group, Beijing. (in Chinese) [张渊媛, 薛达元 (2019) 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获取与惠益分享重要问题研究. 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北京.]

(责任编辑: 薛达元 责任编辑: 周玉荣)